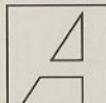


联邦德国的公民教育

Politische Bild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Erfahrungen, Anwendungen und Konzepte für China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

No. 91 (ch)
Shanghai 2009

联邦德国的公民教育^{*}

晏小宝：谢谢诸位前来出席此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上海办公室和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之所以选择这个研讨题目，大家应该知道，中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如何加强公民教育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而关于这个话题，有一个远在欧洲腹地的国家——德国——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在过去两百多年里，德国走过一段非常崎岖的道路，它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今天很有幸请到海峡对岸曾经号称“台湾第一战舰”的朱高正先生来担任本次研讨会的主讲。

朱先生从1987年就担任台湾“立法委员”，一直到1999年。同时，他还在德国波恩大学获得过哲学博士，主要研究康德哲学。我们今天来谈德国比较有意思，大家都知道，今年有许多值得一提的大事件，比如说，60年前即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20年前即1989年柏林墙倒塌。今年是德国非常重要的选举年，联邦总统、联邦议院还有很多地方的

选举都将举行。下面我们请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主任Awe博士致辞。

Awe：亲爱的晏教授，亲爱的朱教授，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很荣幸代表阿登纳基金会宣布研讨会的开始。我想借此机会来介绍一下我们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工作。当被问到“您是否是最适合这个最好的岗位的最好的人选”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尼迪总统回答说，“不是，但我总能和最合适的人坐在一个房间里工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能够为这次研讨会找到最好的报告者、最好的讨论者和最好的参与者。

对德国政治基金会来说，政治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悠久的工作。当然，在世界各地有商业基金会、工业基金会一类的基金会，但政治基金会这种组织形式是德国特有的。德国目前有六个政治基金会，它们都和有关政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国的政治基金会能够成立并开展工作，和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有很大关系。当1949年德国的政治基金会成立并开展政治教育工

^{*} 系根据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上海）与上海市现代管理中心于2009年2月24日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会议资料整理而成。

作时,唯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面对二战以后的德国。大家知道,德国在二战中经历了独裁的统治,文化思想领域遭到摧残。所以对德国来说,在二战以后

战败的状况下,如何使德国人民获得力量,重拾希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政治教育作为一个词汇来说,有着比较长的历史;但是它作为一个组织机构,是从 1952 年开始的。1952 年,成立了一个具有法律形式的政治教育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与德国的其他政治基金会相比,阿登纳基金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它的名称。刚才说过,德国有六个政治基金会,它们分别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和斐迪斯·瑙曼基金会。但其中更有名的是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因为阿登纳是 1949 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首任联邦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阿登纳基金会有很大的竞争力,也更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工作。至今,我们阿登纳基金会仍在面向德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进行大量的国民教育工作,每年各种各样政治教育的参与者将达到 15 万人次。对德国和我们这样一个基金会来说,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在我们联邦德国 16 个联邦州的任意一个,阿登纳基金会都设有培训机构,开展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我们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的总部设在柏林,第二总部

设在波恩附近的圣奥古斯丁。为了促进各国与人民之间的交流,我们开始在国外设立办公室,在中国有北京和上海两处。

我们的首任联邦总理阿登纳说过一句话,“政治不是一切,但政治又蕴含在一切事务之中。”要强调的是,我们阿登纳基金会与贵国不仅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体现,我们还非常强调双方的学术界,双方的大学生,双方的青年人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像上海这样一个地方,由于其特有的区位优势,这种交流应该搞得更好。为与大家更好地交流,我们愿意抛弃成见,做一个倾听者。关于德国的公民教育,将由朱教授来详细介绍。我在这里再讲一个不同国家之间交流的例子。从来没有一次,中国在德国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所知晓,被大家所需要,被大家看得如此重要。原因在于两年以来,特别是去年以来越来越严重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美国的前参议员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中国的形象做了一个完全的改变,而且就在中国工作的我们阿登纳基金会而言,现在每个星期都有人要求我们对中国的最新状况作出分析、判断和预测。大家都很想知道,中国在挽救世界经济中将起到何种稳定局面的作用。大家知道,政治教育首先要向人们提供有关的信息,如果人们能够掌握相应的信息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参与感,就会参与对相关政策重组或塑造的

过程。政治教育工作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例外,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政治教育工作在某个国家或地方存在真空,那里表面上看上去是很平静、和平的。但在危机时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会出现一种紧张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教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

晏小宝:Awe先生已经在给我们破题了,下面我们请朱高正博士就二战以后“联邦德国的公民教育”作演讲。

朱高正:我首先要向阿登纳基金会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我1980—1985年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是领的阿登纳基金会的奖学金。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后,算是提前结束学业,阿登纳基金会非常高兴,特别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说,我想到世界三个文明古国好好去看一看,想到希腊、印度和埃及去看一看。阿登纳基金会负责了我全部的旅费,而且我请他们安排以前拿过阿登纳基金会的奖学金并在德国完成博士论文的当地人,在我离开前的最后一晚与我一起讨论希腊、印度和埃及的情形。他们都帮我做好了。等到德国统一之后,我的博士论文在德国已经出版,而且得到很高的评价。阿登纳基金会特别采购了四百本,送到德东所有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认为我阐述的康德关于人权的哲学,对德东的民主重建会有非常正面的效果。所以当晏主任邀请我来就战后德国

的公民教育作报告的时候,我感到义不容辞。

事实上,德国是一个很理性的民族,德国人要想干什么,一定会想方设法真的就按照那个来干。比如说,德国在战后想要把纳粹的那种极权统治、恣意统治彻底排除掉,不是因为美国人说你要“去纳粹化”,实现“民主化”,而是德国人认为,未来德国要想不再走上那种错误的道路,就要把德国的内部好好改造一番,所以就要开展政治教育。我们看看今天的德国人,他们对德国在二战中对犹太人所犯的那些罪过的态度是怎么样,再来比较一下日本人的态度是怎么样——他们对慰安妇的态度有很多违反人道的地方。这就是因为德国有政治教育,而日本没有政治教育,就差在这里。德国的政治教育,不是一种政治的教条的宣传。人类社会能够长久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在哪里?就是要把人当人来看待。怎样把这些基本的价值灌输到政治的日常实践当中,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在讲德国的政治教育之前,我想引用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当中讲过的一句话,他说一个政治体系能否稳定,跟这个政治体系所采用的教育理念是不可分开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想法是这样,政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个人说了算,一群精英说了算还是大家(自由民)一起说了算。每一类政体又可以分

为好的政体和不好的政体,好的政体是按照法律来的,不好的政体是按照个人的恣意,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来的。比如说,一个人说了算的是君主制,如果是不好的,那就叫暴君制。如果是一群精英说了算,好的叫贵族制,不好的叫寡头制。如果是大家说了算,好的我们现在叫做民主政治,不好的叫暴民政治。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分为这六种。如果你是采用君主制,而你的教育是采用平民政治的,那等于在那里培养一大堆人来反对你的君主制。如果你是采用贵族制,那你不能去采用那种哲王式的教育,那样的话就不协调了。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政治与教育是一体的两面。军、公、教是最早享受社会保障的,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军队代表赤裸裸的暴力,公是运作整部政治机器的,教是培养未来的能够支持这个政治体系的人的。所以军、公、教是最早享受社会保障的,后来劳工出来闹,才会有保护劳工的立法,后来是农民、自由业者等,慢慢地普及开来。我们现在讲公民,过去叫臣民。臣民是什么?就是单纯的被统治者。公民教育就是培养你成为国家的一个“股东”,国家是你的,你可以参与建构国民总意志。在这里面,怎么样把大家从一个被动的被统治的臣民,转化为积极主动地关心公共事务,把公共事务当成自己的事情的公民就是政治教育的主要职责,只有这样

国民才会热爱自己的国家。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是全世界最早普及义务教育的,他们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提升国力,这其实就是最早的公民教育。简单地讲,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每一个国民能够有能力负责任地、积极地而且是批判地来参与建构国民总意志。国民总意志应该是卢梭最早提出来的,就是说法律应该是国民总意志的体现,而不只是个人的意见而已。国民总意志用英文来讲是“General will”,什么叫“General will”?就是“I will”、“You will”,大家都“will”。“will”就没有什么对不对,这是意志的问题。一个统治者如果是按照国民总意志来行事,它就有正当性。如果违反国民总意志的话,就会与被统治者产生矛盾。公民教育或政治教育的前提,就是要每个人能够自由地从不同管道获取关于政治权利、义务、国家机关组织运作的信息。打个比方,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也就是说,一定要让国会议员能够从官方信息渠道以外获取更多的信息来源。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的话,我给你什么信息你就只能根据这些信息去做判断。如何保证信息渠道是开放的,我认为,网络时代提供了非常可贵的条件。只有公民对自己的权利、义务,对国家组织机构如何运作有了清楚的了解,他才有能力参加、经营政治生活。更进一步说,我们的政治生活应该怎么改进?举例来说,德国的选举制度

大概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选举制度。日本人想学,学不来;台湾想学,也学不来。德国的《联邦选举法》,在欧盟现在是被普遍采用,像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来借鉴的。

公民教育的实施,我们分成两大块来讲。一块是在学校里头,尤其是小学、中学是最重要的。在义务教育这个阶段,如何让大家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政治的权利、义务,知道宪法的基本规定是什么,这就需要在中小学课程里面制定相关课程标准,尤其是在历史课、地理课或语文课里。除此之外,还要特别开设一门公民课或者社会课。此外在社会上,就是在他们毕业之后怎么办?在这一块,电视媒体或者新闻、杂志、网络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如何让一般的国民离开学校之后,在实际生活当中能够通过天天发生的事情、报道、评论,在政治实践或法院的判决当中来巩固或者深化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基本上有两大类型,一种是一党制的公民教育,另外一种是多党制的公民教育。其实这种划分,是现在划分方法,我是有点看法的。比如说开明专制,你要把它归在一党也不对,归入多元的也不对。像中国现在,如果一下子全部放开,我看也不太对。但是如果撇掉政党的因素,我应该培养国民认识哪些公共生活里面是非善恶的基本的判断标准?这就还是要像过去的开明专制

那样,把这些内容放到国民教育里面。比如说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都是这类开明专制的代表。也就是说,你掌权的人为了国家的进步,有时候要看得更远,而不只是为了巩固你现在的权力基础。我在这里简单地讲一下,一党制的公民教育其实不能叫教育,应该叫政治训练,就好像训练狗要听话那样。比如说纳粹就是这样的,它跟你讲雅利安是优秀的种族,犹太人是劣等种族,不要跟犹太人结婚。你不听,不听就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纳粹时期德国的精神病院,是德国历史上最丑陋的一页。甚至有人娶了犹太女子,就在精神病院里被剥夺了生殖能力。

我现在着重要讲的是多党制的公民教育。多党制的公民教育,现在的德国就是这样。德国现在有6个党在国会里面有代表,每个党都有一个公民教育机构。但是在德国,6个党不是各吹各的喇叭,不是这样。在德国,政党不同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基本价值,那就是基本法。比如说每个政党,对内你不能违反党内民主原则,因为如果一个党违反党内民主原则,那比黑帮还恐怖,纳粹就是这样。一个党一定要允许内部有不同的意见,要让不同意见有公开表达的机会,让它有机会争取从少数变成多数。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早期的时候还是这样做的,还特别针对少数意见让大家有机会去讨论。我们讲多元的社会就有多元的

价值,但是这种多元的相对主义想要抹杀道德的、伦理的绝对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就要有一些大家共同信守的价值体系在那里,比如说宽容。你像欧洲以前为了宗教信仰,宗教战争打了几百年,有什么意义吗!又比如说我,我是很崇拜孔子的人,但我对佛祖也很尊敬,这不影响我对孔子的敬仰。佛祖一个人可以影响那么多人,而且影响力两千多年不断,一定有他人格伟大的地方。我不信基督教,但我对耶稣也是很敬仰的,我也同样可以对穆罕默德很敬仰。就是说,你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但是对不同的信仰要宽容,要尊重,当然要是能够互相欣赏更好。在多党制的公民教育里面,特别强调怎样去建构一种和平解决冲突的机制。大家意见不同,当涉及利益问题产生矛盾的时候,冲突就很容易尖锐化。那么在冲突尖锐化的过程中,不要动不动就采用过去比较极端的社会革命论,动不动就把所有的冲突都还原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阶级对立的矛盾。没那么简单,我们对这种问题要谦虚一点。这里面当然就涉及到要形成哪些共识,哪些基本价值。我认为公民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怎样在经营公共生活过程当中,能够去分享、捍卫这些基本共识和价值。

下面来谈联邦德国的公民教育。谈到德国的公民教育,就不能跟它的历史

分离开。德国的公民教育之所以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是跟它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大家看提纲,我把德国公民教育历史背景的第一段定在 1815—1866 年。为什么要从 1815 年开始,这要从 1815 年也就是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形势谈起。而之所以止于 1866 年,是因为这一年普鲁士打败奥地利,把奥地利的势力挤出北德意志联盟。1815 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成立的德意志邦联,基本上没有一个像样的,由老百姓经由普选产生的议会,而是由各个公国、侯国派来的私人的代表,而且是由在维也纳的梅特涅在那里操控。所以德国那个时候的情形,讲起来是很可悲的。那时候有两大思想主流,一个就是自由主义,另外一个就是要追求德国的国家统一。当时的大学生协会要求统一,要求自由,结果很多人被逮捕、被追杀。那时候梅特涅实行非常反动的保守政策,因为这些要求也有悖于奥地利的利益。

但是 1834 关税同盟的成立,1835 年德国铁路的迅速发展,对德国的统一都有很大的帮助。1848 年发生了几件大事,一个是三月革命——这当然是受到法国 2 月革命影响——导致梅特涅下台。然后就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共产党开始走上历史舞台。1862 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的首相,完全撇开普鲁士议会,推行铁血政策和军队的改革。俾斯麦于 1864、1866 年先后打败丹麦和奥地

利,成立北德意志邦联。其实北德意志邦联只是一个过渡期,南德诸邦事实上已经跟普鲁士走在一起,它们的外交政策和对外作战都唯普鲁士马首是瞻,包括对法作战它们都是派兵参加的。1870年击败法国之后,就成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讲起来,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前20年,是俾斯麦在用心经营。这里面有一个小典故。当初打到维也纳城下的时候,俾斯麦要求大毛奇不能进维也纳。他说,将来还要进行对法战争,不能让维也纳太过屈辱。所以来普鲁士跟奥地利签订的和约,是历史上最宽松的和约。也就是说,你奥地利不要介入我们北德意志邦联的事就好了。这样就把奥地利排挤出去,普鲁士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理上成为北德意志邦联共主的地位得到确认。等到打法国的时候,大毛奇就不听话了,就直接打进巴黎了,而且还在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成立。这给法国人刺激太大了。德军进入巴黎凯旋门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掉着眼泪说,他妈的,此仇不报非君子。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老虎总理克里孟梭。所以来一战之后签订“凡尔赛和约”时,法国对德国很苛刻,德法世仇就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之后,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其实就两条,第一条就是孤立法国,绝对不能让法国再起来。所以他远交近攻,拉拢俄国、拉拢英国。

第二条就是采用非常小心谨慎的海外殖民政策,让英国也没话讲。由于俾斯麦的努力,至少在他掌政期间,欧洲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俾斯麦曾经自得地说,我是非常诚恳地搓圆子汤的。意思就是反正你们有什么冲突,找我摆平就对了。在内政方面,俾斯麦是非常保守的,但他在社会立法方面却非常地先进。要解释俾斯麦,很难解释。俾斯麦当普鲁士首相的时候,就跟拉萨尔交情很好。拉萨尔这个人太可惜了,1863年为了一个女人跟人家争风吃醋,在苏黎世跟人家决斗结果被杀死了。那时候拉萨尔跟马克思两个人是死对头,拉萨尔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可以说是第一个劳工的政治组织。他的路线和马克思有三点最大的不同,第一点,他认为经由议会路线可以改善劳工的生活条件,所以他要走议会道路。第二点,他坚持要解决德国劳工问题,绝对不能走国际主义路线,一定要走德意志民族特色的道路。他特别强调德意志特色,因为德意志劳工的状况跟英国、法国劳工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最后一点,他反对激烈的阶级斗争路线。这三点是他跟马克思最大的不同,当然如果没有马克思,拉萨尔的路线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挥洒的空间。我看这是一手软,一手硬,两者不要互相排挤,都是为劳工好。

俾斯麦1890年下台之后,他的整个政策都被抛弃了。1889年,皇太子死

啦,皇太子死了一定会出事情。在中国也一样,洪武二十八年,皇太子朱标死了。一个皇太孙上来,培养不够啊,以前都在培养皇太子,突然死掉,那肯定会出现问题。德国也一样,那时候德国在欧洲已经是大国,威廉二世不知道得来不易,不懂得珍惜。《易经》中“大壮卦”讲得好,大壮要刚而能柔,才能常保其壮。你不要擅用刚强,擅用刚强很快就没了。以前老皇帝在的时候,俾斯麦跟老皇帝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他就递出辞呈,老皇上马上就听他的。威廉二世上台之后,俾斯麦跟威廉二世意见不合,他也递出辞呈。结果,小皇帝就准了。因为俾斯麦下台的关系,德国内部的社会矛盾加剧了,跟外面的关系也越搞越糟糕,跟英国、法国全部都翻脸了。三皇同盟变成了两国同盟,跟奥地利或者再拉一个不太起眼、刚刚冒出来的意大利成为三国同盟。结果,1914年就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社民党和共产党的问题。为了是否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社民党就发生分裂了。社民党里分化出独立社民党,后来1916年就和罗莎·卢森堡的“斯巴达克同盟”组成德国共产党。为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跟德国社民党也延续了历史的仇恨。我在德国碰到大陆来的研究德国社民党的人,统统都是从负面来看。1999年龚育之先生从中央党校副校长的位子退下来,因为他经常听我讲德国

社民党的事情,所以他第一次到德国访问就是去改善中国共产党与德国社民党的关系。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走的路越来越精明了,不再像过去老“左派”那样硬邦邦的、教条主义的。要是那样的话,共产党早就垮了,所以说共产党已经调整很多了。我估计共产党那个时候比1914年的德国社民党走得还要远了。我们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跟拉萨尔强调德国特色道路不是一样的吗。

我在这里再插一点,1880年代,在德国出现一股哲学思潮,很多哲学家在调和康德和马克思,就像现在党校里面也有不少人在调和儒家和共产主义。我第一次看到儒家共产主义是在德国,1984年,德国出过一本《儒家共产主义》。那是在1984年,中央党校丢人啊,慢了十几年才有儒家共产主义。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比德国更进步一点了。康德在德国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得到很大的重视,但我要说,二战以后康德在自由主义阵营得到更大的重视。

接下来,1919年的魏玛共和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次给劳工、妇女投票权,给劳工最完整权利的宪法,就是魏玛宪法。但是魏玛宪法有一个大漏洞,那就是第48条“紧急授权法”。经济大萧条之后,社会太乱了,这个“紧急授权法”在1930—1932年布吕尼时期实行过两年,以回避国会的监督。这些恰好给希

特勒上台制造了条件。1933 年希特勒上台之后,他就按照宪法第 48 条发布第一条指令说,魏玛宪法所有条文,在不抵触纳粹党章的情况下继续有效——也就是把党的地位抬高到国家之上了。这样一切都乱套了,完全没有任何法治。对纳粹的狂热让很多人失去理性,比如海德格尔在参加纳粹集会之后说,只有在领袖的身上,我们才看得到德意志民族的未来。一个大哲学家讲这种话,所以我后来都不看海德格尔的东西了。我估计就是当时《凡尔赛和约》对德国人的刺激太大了,德国人想要重新站起来。到最后,只要谁能让德国重新站起来,我就支持谁,这就走偏了。

我在这里要谈一下犹太问题。纳粹对犹太人绝对是残忍的,但我在这里要讲,德国并不是对犹太人最刻薄的民族。英国人对犹太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人是没有必要对犹太人不好,因为美国土地那么多。英国人长期不给犹太人法律保护,法国人也不保护犹太人,波兰人也迫害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在德国最多?很简单,德国人对犹太人相对比较好。但是一战战败之后,德国的军队是非常齐整地走回来的,没有人相信德国打了败仗。那就要找一个替罪羊,于是大家都说钢铁工业、军需工业、金融业、媒体都控制在犹太人手中,那就把犹太人当作导致德国战败的罪魁祸首。所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讲这个,到

最后不是希特勒喜欢杀犹太人,因为按照这套逻辑,到最后只好把犹太人都杀掉。所以对于犹太人问题,德国在战后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检讨。战后对于迫害过犹太人的德国人,德国人也不手软。我们来看,日本人有这样检讨、反省过吗?

我现在讲一下“Gleichschaltung”的问题,什么是“Gleichschaltung”?这是纳粹特有的术语,就是把开关一拉上去,房间里的灯全部都要亮;开关拉下来,全部都要灭。纳粹是世界上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完成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什么是极权主义?过去只是威权统治而已,只涉及政治生活。但到纳粹的时候,到星期天全民要进行“国民义务劳动”,老板和雇员都要穿一样的“国民服”,开车都要开“国民车”,最后大家都要留个“国民胡”。大家都要一样,你想不一样,那你就有问题。

希特勒上台的时候,纳粹只有 32% 的支持率。他一上台,就开始追捕社民党人。搞到最后,跟纳粹意见相反的人统统都没了声音。在纳粹统治之下,连法官都是很可怜的,法官在审案的时候,全程录像。你法官的脸色不太对,它就要开始调查了。另外,每个人都要有血统书,来证明你的爷爷就是雅利安种。搞到最后,希特勒本身的血统变成国家最高机密,因为他没有办法证明他的爷爷是雅利安人。所以说,那个时候完全

没有自由,是恣意统治,是赤裸裸的暴力统治、特务统治,而且非常高效。当内政变成这样的时候,对外当然是实行扩张主义,要求“合理的生存空间”等等。

我总结一下,从 1815 年以后,德国有一股思潮在那里互相争斗。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国家主义,另外一个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曾经在魏玛时期,以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出现过。民族主义追求国家统一,到最后变成德意志民族不断地扩张。比如说,俾斯麦追求的是小德意志,希特勒追求的是大德意志。他不只是要把奥地利吞掉而已,而是只要有德国人的地方就要统统弄过来,比如捷克的苏台德区。社会主义是表现在社会立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上面。

从 1945 年以后,占领当局实行“去纳粹化”、“民主化”和“把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水平恢复到 1935 年以前的水平”的政策,这些政策要等到冷战以后才有所改变。我在这里要提一下,1949 年之后,康德本来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扮演很吃紧的角色。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曾经把康德《论永久和平》当中的一段

文字,拿给大陆来的“左派”的同学看。他说,这是马克思写的。我说不是,这个比马克思还要早 50 年。其实对于殖民帝国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掠夺,康德的批评绝对不比马克思来得客气。1949 年之后,康德在德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比如说,德国

联邦宪法法院常常直接引述康德的著作,尤其是德国宪法第一条——“人的尊严不可亵渎”。一般人往往把这段翻译成“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其实不对,应该翻译成“人的尊严不可亵渎”。“antasten”在德文中的意思是“触摸一下”。人的尊严连摸都不能摸,这是什么意思?按照《旧约》,这是耶和华跟摩西互相许诺的。也就是说,你遵守上帝的戒律,你就可以和平,可以繁衍种族。这个许诺是很神圣的,是代表摩西和上帝的约定。你只能膜拜,碰都不能碰一下。也就是说,人的尊严是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繁荣发达的基础。什么叫尊严?尊严在德文中是“Würde”,准确的意思就是“不可替换的价值”。任何价值都可以买卖、交换,尊严是不能替换的。所以说,德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亵渎”。为什么?人都要从历史里面去总结教训,纳粹对人的尊严的糟蹋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秦始皇都没有那样,中国历代有一些昏君,但他们只是粗暴、蛮横,不像德国是通过制度、特务把人的尊严彻底糟蹋。

我 1984 年第一次到东柏林,先做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到施陶芬伯格上校被枪决的地方去致敬,第二件是到柏林的老坟场向我很尊敬的费希特致敬。黑格尔就埋在旁边,墓碑高度只有费希特的三分之二而已。我想说的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对其民族民主、法治的建设影响如

此深刻,这非常难得。康德的自由主义和英国的自由主义很不一样,它是可以包容社会主义的优点的。而像英美那套自由主义,是永远站在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的,两者是不能协调的。所以从康德这里,可以发展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大陆宪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是有一点小功劳的。第一次回到祖国的时候,我向中共建议,如果中国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又不要掉进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陷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向联邦德国学习,采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我在大陆办了18场研讨会,那时候是1990年,根本不能讲市场经济,顶多讲商品经济。我很失望,后来就不来了。1990年12月我来大陆,以后两年半没来大陆。等到1993年3月份,北京打电话告诉我说,朱先生,你的建议我们现在已经采用了,刚刚放进宪法第15条,只不过是稍微改了一下。因为我提的是“生态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他跟我讲,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搞生态的,而“社会市场经济”要改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欢迎你过来。

因为康德的自由主义可以包容社会正义,所以我认为德国的自由主义是了不起的。美国人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要到1985年之后,美国人才发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有它的长处。康德哲学的核心就是以人的尊严为目的,也就是说把人当作目的本身,

每个人本身就是目的,不能把人当工具,要把人当人看。如果用张载的话来说就是,集阴阳储精,五行之秀才能成为人,人是五行之秀,万物之灵,所以对人要尊敬。大家看《尚书》里面谈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什么意思?你如果玩弄人家的感情,玩弄人家的诚恳,玩弄人家的好意,那你就是丧德。所以说,康德的自由主义能够包容社会主义的许多优点。我常常讲,社会主义凭什么说自己比资本主义优秀?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好处你都有,而资本主义的缺点你又没有,才可以说你比人家先进。我觉得德国在这一点上是做到了。正因为以人的尊严为核心,所以说国家是为人而存在的,不是人是为国家而存在的,人才是目的,人本身就是目的。

有了权力就会滥用,怎么样来制止权力的滥用?那就只有把权力分开,让它们互相制衡,才能避免权力的滥用。所以说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也是为了保障人的尊严和人权而来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讲得非常好,他说权力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是制定法律的权力,第二个是执行法律的权力,第三个是裁决法律的权力。他说,这三种权力只要有两种权力在同一个人或者同一群人手里,那老百姓的自由就没有保障了。我觉得讲得非常经典。你想想看,如果说制定法律的权力和执行法律的权力是在同一个人手里,我要干啥我就立

个什么法,那我永远都是合法的吗。这就是法哲学里面所探讨的,在实证法之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更高的自然法的问题?因为实证法本身可能是有缺失的。过去国民党就是这样,国民党说,法院是我们开的,“立法委员”永远不必改选,要当到反攻大陆为止,不准建反对党。国民党的这一套就是被我打破的,民进党的创建有我的一份心血。

我讲个笑话给大家听。原来维也纳大学的校长 Winckler 教授到台湾,通过外交部一定要找我。他说,听说朱委员是一个研究康德的专家,他怎么会在“立法院”里面这样打打闹闹的。我说,Winckler 教授,你在台湾那么多学生,有国民党的,有不是国民党的,也有反国民党的,你去问他们看看,有没有比我现在所作所为更温和一点而可以逼国民党接受改革要求的?如果有,那就是我不对。我已经是最温和了,我是最温和的激进派。后来他想想说,那我沒话讲。在进“立法院”之前,我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我就公开讲,我自己很清楚,我现在处在一个历史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也就是说,我怎么样用非暴力的手段,来完成人类历史上几乎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完成的政治改造工程?我相信我做到了。我跟别人不一样,他们都要打倒国民党。我说我从来不会讲打倒国民党,我不要国民党垮,我只要国民党慢慢垮而已。慢慢垮,当再不改就真的会垮掉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改。我再讲个笑话给大家听。我高三的时候搞过一个读书会,要参加这个读书会一定是要全班前三名或者全台湾论文比赛或者书法比赛等前三名的才行。那时候国民党就要办我了,风声鹤唳,我那时候才搞清楚国民党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一把手,二把手的哥哥是调查局的,它叫哥哥来办弟弟的案。我那时候在日记上写了一段话,很经典,三十几年后再来看,我不得不佩服自己有远见。我是这么写的: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度,要从事政治改革,就得先要有不怕坐牢的决心与勇气,但也不能太早坐牢。最理想的境界是搞到快要坐牢的时候,突然不用坐牢了。为什么?或许是由于我们的壮大,使得当权派不敢小觑我们;或者是由于我们的牺牲奋斗,使得当权派内部发生分化;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些话就印证在我身上。

我接着讲德国的公民教育。德国宪法就是以人的尊严和保障人权为核心,来规范整个国家宪政体制的关系。1990 年之后,德东地区进行改造,把统一社会党的影响完全清除掉。首先是把原德东地区的法官、检察官全部撤掉,派大量的德西地区的法学教授进驻德东地区。当然,我在这里要讲,联邦德国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造成德东地区变成二等国民。如果那时候他们采用一国两制的话,就不会这样了。也就是说,你应该让德东地区的法律继续有效,要慢慢改,

只有在违反民主法治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才弃用。否则的话,很多德东地区的老百姓跟德西地区的人做生意,就被欺负了。因为我要按照你的游戏规则,有的人心术不正就来骗人。所以联邦德国有时候确实也要向我们伟大的祖国学习学习。

下面我来讲一下联邦德国公民教育的内容。读联邦德国宪法,你千万不要从第一条开始读,那是错误的。要读联邦德国宪法,就要从第七十九条第三项开始读起。联邦德国宪法第七十九条是在讲有关基本法修改的问题,它的第一项规定,要修改联邦德国的基本法,一定要经由法律的形式才能修改,也就是一定要在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里面经过三读的程序才能修改。第二项规定,要修改联邦宪法,一定要得到联邦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还要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同意才能修改。第三项是最重要的,它规定下面的宪法条文是不能修改的:联邦体制不能改;各个邦参与立法的权利不能改;本基本法第一条和第二十条不能改。这四点不能改。第一点,联邦体制为什么不能改?如果是单一国家的话,地方就被漠视了,要尊重德国的历史事实。第二点,各邦参与联邦立法,邦有邦的立法权,联邦有联邦的立法。你看德国的文化保存法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为什么?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有感情。我

觉得大陆现在在这一点上也做得不错。它不会把好的东西全部拿到北京去,你要看某些东西只能到我上海博物馆来看,你要看曾侯乙墓,只有到湖北省博物馆才看得到。第三点,基本法第一条是什么内容?第一条有三项,第一项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亵渎,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所有国家公权力的义务;第二项,德意志民族认可天赋的、不可让渡的人权乃是世界和人类社会和平、正义的基础;第三项,下面的这些基本权利直接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是直接有效的法律。那不是人权清单,写着好看的。第四点,我们来看第二十条,该条很有意思,讲的是宪法基本原则和抵抗权。我那时候到德国去学习,最早是要学“革命权”,后来我读康德之后,觉得不太对。没有革命权,革命可以同情,但不能当作权利。该条第一项规定,联邦德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联邦国家。第二项,所有的国家权力都是从人民而来,这叫国民主权原则。所有国家公权力都要由人民选举投票产生,而且这些权力要分别由特殊的机构来行使,也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不能混在一起。第三项,所有的立法都要符合宪法的规定,行政权和司法权要遵守法律和判例的规定。最后一项,任何人如果想破坏这个宪政秩序,那任何人都可以有抵抗权,但是在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用的情况下。这就是基本法第七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联邦德国公

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些。最后,我在这里总结一下以法治国的七项原则,第一项,人的尊严和人权是所有国家公权力及机关要捍卫的,你国家机关不能滥用公权力来伤害人的尊严,伤害人权。第二项,国民主权原则,也就是说,制宪权、修宪权属于全体人民。你不能让一般立法机关来行使修宪权,因为它是立法权。第三项,国会至上原则。第四项,责任制度原则,也就是说行政权要向立法权负责,做不好,你就下台。第五项,司法独立原则。第六项,多党体制原则。第七项,要有一个不受公权力影响、左右的媒体制度。讲监督讲半天,如果媒体一定要看你的脸色来决定哪些能报道,哪些不能报道,那是不对的。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很多问题。

最后讲一下当今中国如何借鉴联邦德国的公民教育。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我就不多讲了。民主、科学是“五四”的时候大家总结出来的,要民主和科学,也是为了中国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如果放在现在来看,民主就是民权主义的问题,科学就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就是反帝、反殖民、反分裂的问题。如果用孙中山的话来讲,分别就是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如果用今天中国内地的话来讲,总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科学就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就是提升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地位,当然还有两岸的和平统一问题。如果用德国的话来讲,就是法治国、社会国和文化国的问题。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引子,至少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比起当初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好多了。以人为本,这跟人的尊严很多方面是可以汇通的。和谐社会——讲句实话,贫富差距太大,地区差别太大。同样是人,为什么农民工的子女在许多方面要受歧视。要注意,现在农民工的子女已经开始出现第三代。第一代他是无所谓,只要比在农村好就行。当第二代农民工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太平衡了。现在农民工的孙子出现了,那感觉就更不对了。所以我们要回到基本点,把人当人看。至于科学发展观,我认为就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当代中国版。我们要遵守客观规律,所以说科学发展观是有其意义的。

我就报告到这里,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谢谢大家。

朱学勤:非常感谢朱先生精彩讲演,我提一个问题。朱先生刚刚讲到德国的一个哲学家费希特,我们知道在德国历史上,费希特是作为民族主义的第一人而进入德国历史的,但是民族主义在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发生了很不幸的病变,给这个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我希望听到，民族主义在德国历史上是怎么扭曲公民建设的？也希望你能够结合两岸的现实——因为台湾有台湾的民族主义，大陆今天也有大陆的民族主义——来谈谈德国的这个问题。

朱高正：费希特跟康德很不一样。严格来讲，康德并不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国家观念相对比较薄弱，他也曾经具有俄罗斯的国籍。他有个好朋友是俄罗斯的大将，康德教过他们筑城学。所以康德严格来讲是普鲁士的哲学家，不是德国的哲学家。费希特就不一样了。费希特1795年的一些作品，还有人以为是康德用笔名写的。费希特是一个很典型的接受康德基本思路的人。费希特在他那个背景之下，在拿破仑带来的理念的破灭之下，遭到法国、奥地利的压力，他才会呼吁德国人要团结起来。德国那时候四分五裂，分成几十个国家，他希望德国人应该要团结起来。

所以要费希特为后来被扭曲的变成扩张性的民族主义负责，是不公平的。德国的民族主义在俾斯麦的时候有相当的节制，因为它走小德意志的路线。应该这么说，大毛奇应该负点责任，因为跟法国结下梁子，造成以后德法世仇。《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光彩的事情，希特勒会利用这种民族情绪来团结德国人民，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像我们现在对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肯定和确信，里面有很多偏颇的地方。我相信，

在二次大战以后，联邦德国走的路，包括从煤钢共同体开始，到欧洲共同市场，再到底现在的欧盟，我们认可它所走的路是一条文明的道路。

民族主义最可怕的是变成一种情绪化的、不负责任的政客来为自己解套的工具。事实上，民族主义可以分为理性的民族主义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我对理性的民族主义的界定是：确定以人的尊严为中心，以人为本，把人当人看，把人当做目的，绝对不敢把人当做工具来用。这样的话，一方面，由于分享共同的语言风俗、历史记忆、生活习惯、大家在一起构成一个民族，这是人情之常；另一方面，对不同的民族，不是去敌视它，不是去打压它，而是希望跟它进行交流、交往与学习，也可以丰富自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一个概念叫 Glocalization，一方面在 Globalize，同时要 Localize，只有更加地本地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才不会迷失。

真正的成功来自心胸开放，而不是闭锁，要愿意学习，愿意去接受别人的价值。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受过人类学的教育，他不会对不同的文化轻视与敌视。老子讲得很好，高是以低为基础的，贵是以贱为基础的。我小时候，条件很不好，没有自己的毛巾。后来去外地读初中，有了自己的毛巾。但是我擦脸的毛巾和擦脚趾头中间的毛巾永远是同一条。我非常疼我的脚，脚就是我们的“根”。一

个统治阶级如果不懂得最底层的民众，就没有资格当领导者。一个社会一定有阶级的，但阶级分类不一定是坏处，重要的是让不同的阶级之间保持灵活、有流动，努力的可以上去，不努力的会掉下来，有一个公平的大家能够接受的可以容忍的限度。在我看来，合理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的。

不合理的民族主义那就不一样了。它就把自己捧得很高，像欧洲白人至上，像英国早期竟然把非西方的民族当成是白种人的负担。英国人在澳大利亚去射杀土人，认为他们不是人，是猴子。这在中国是不可能有的现象，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就没有奴隶的国家。日本到明治维新的时候还有贱民，印度到现在还有旃陀罗占人口的三成。而中国早就不是这样了，虽然有长工，但是很文明。你家长工的小孩要是会读书的话，你没有栽培他，你就会遭到当地人的批评。人家这一辈子当长工，把小孩照顾好，也有出头的日子。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我不认为它就是坏东西，如果是以为核心、以为本，对内对外都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以情绪为主、以仇恨为主，不仅对外会出问题，对内也会排除异己。

下面我就讲讲台湾的民族主义与大陆的民族主义问题。大陆的民族主义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和中国 1840 年以来鸦片战争不幸的遭遇，以及遭到列强的瓜分有关。一定要到 1949 年以后，中国人

才把外国人的殖民势力彻底赶出中国。但是后来和苏联的理论争论，在美国的大三角的战略下，等到苏联人一垮，中国的利用价值就没了，直到最近美国才在修补这些历史问题。所以说中国人被压抑的情绪随时都会爆发出来。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要化解这种过激的民族主义，光批评没有用，一定要有一个为了中华民族长久的和平繁荣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基本价值，利用这个进行说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内部矛盾激化的时候，很难排除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利用民族主义来捣鬼。

战后德国的一个总统 Theodor Heuss，在 1949 年创建基本法的时候坚决反对公民投票。他有段话，我非常佩服。他说：我们反对公民投票，并不是对人民的智慧没有信心，而是因为在公民投票的过程当中，从要公决的题目的设计到投票为止，实在有太多的机会可以给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进入，捞取个人的不当利益。比如，拿破仑搞过三次公民投票。每打一场战争，打赢了回来就公民投票一次，有 95% 以上同意。第一次投票，本来有三个执政，他要求说别的执政当四年，他这个执政当十年；第二次，十年的执政还不够，改为终身执政；第三次公民投票，就变成改为帝制了，法兰西共和就这样没了。拿破仑三世也一样，也搞了三次公民投票，法兰西共和又没了。希特勒也一样，也搞了几次公民

投票。比如奥地利,你都已经把人家占领了,再来投票说同意不同意和德国合并?都被你搞掉了,还用得上叫我同意不同意!所以说,公民投票常常是阴谋家用来为其不当的行为披上合法外衣的工具。很多人不知道,台湾现在也还在公民投票。第一次公民投票说什么要对抗大陆,买飞弹。但是没通过。没通过怎么办?照样买!

举这个例子就是要给大家看到,民族主义很容易被滥用误用,这是大陆的问题。我觉得大陆的问题一定要用一个更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基本价值去解决,而这个基本价值一定要从丰富的中国传统里面去找寻,找出一些真正中国人喜爱的东西,千万不要把西方人的东西拿来当我们的。我常常跟人讲,“你为什么要去学瑜伽,为什么不学太极拳?瑜伽学得再好,那也是用梵文写的,看不懂梵文,你只能去看印度文或者英文翻译,这就换了两三种语言,你永远没有发言权。如果好好练太极拳,太极拳谱、太极拳论,用中文写的,你也会有发言权。”所以一定要从传统文化里面去找到一些新的元素。毛泽东为什么能鼓动起来中国的农民革命。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讲过一段很传神的话,好几次都被删掉,因为他是在讲道教。在红军大学——就是后来的抗大——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说,“你们看后面是什么?元始天尊就是在这里修道的。你们今天到红军大学来,

就是入山修道,像元始天尊一样。修什么道?修中国革命的道路!修了道,明天就可以去下山行道。”有了这种语言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毛泽东。

下面讲台湾的民族主义问题。台湾的民族主义问题很复杂,我简单讲。台湾的民族主义情结是和“二二八”分不开的。台湾很多精英在1947年2月28号那一次的事件里遭到屠杀,估计被屠杀的至少几千人。因为“二二八”被杀掉后来领补偿金的大概快2000人了,也有人说,被杀的最保守估计2万,最高估到20万。死的都是比较有正义感的,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这对台湾社会真的是灾难性的。因为“二二八”,对国民党的痛恨就转移到对外省人的痛恨,就转移到对共产党的痛恨,台独就是利用这种情绪。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化解,民进党陈水扁把计策都用光了。大陆方面,应该对台湾同胞表达出更大的耐心。我常常对大陆这边的高层人士说,“你要养成一种习惯,碰到台湾同胞就说:‘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问到他答不出来的时候,我看再过三五年,就有和平统一的条件了。”

Gebhardt:作为一个德国人我讲讲你刚才说的一些问题。

第一,我非常高兴听到了中国人对德国的评价。作为一个德国人,我非常重要地强调一点,在说到政治教育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可以从中引进。两次

危机的时候,第一次危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维特根斯坦当时强调哲学就是不讲对错,他用数学来描绘这个世界,不像中国人,还是用哲学来描绘这个世界。

德国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人。但是我们德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不一样,不会阴阳两方面来想;要么就是好的,要么就是坏的;要么就是正确的,要么就是错误的。错误的要改正怎么办?就是要进行一场战争,作为战胜国来改正过来。但是在金色的二十年代,倒是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是否可以用中国哲学来挽救当时的德国。在二十年代的时候《易经》、《道德经》都翻译出来,那时候倒是有这个机会。或者在上海的金色的二十年代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后来有了一个黑色的星期五,有了一个大规模的危机,所以这个情况又变了。由于这个情况,民族主义被引到了反面的结果,大家利用了《凡尔赛条约》。当然他们也利用了一些其他文化的机会,比如说纳粹的旗帜是引进了印度的文化。

但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中国人很难理解,就是“责任”问题。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如果我有罪责,就应该到教堂里面去,把我的情况和牧师说,说了以后让上帝饶恕。但是德国的情况是教会当时也参与了战争。当然,在教会里

面有少数人反对这次战争,但是总的来说,教会是支持战争的。所以德国人当时找不到出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创造之父们想通过立法来找出出路,我认为基本法在德国的法律史上是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当然其中很多具体的法律在二十世纪以前、在二次大战以前就有了,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德意志民族文明化的文明之路并不是从基本法出来才开始的,文明之路很早就有了,但是基本法让德意志民族在文明之路的迈进程度上获得了一个新的框架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我们又从中国学到的东西,第一个新自由主义者是庄子——开个玩笑。但是我认同您前面讲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点不是通过战争取得,而是通过互相理解来取得。德法之间的友谊也是这样,戴高乐当时理解了德国。我是在政治教育行业工作,经常要到法国去,也认识很多友好可爱的法国朋友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出决策的是普通人民,而不是政治家。

朱高正:我简单回应一下。

第一个是文官制度。德国的文官制度是从法国、英国那里学的,英国是十七世纪从新加坡那里学的,是从中国间接学去的。以前康德有个命题:贵族的小孩还是贵族,教授的儿子可不可以是教授? 贵族可以世袭,教授不能世袭,要通过你自己的努力,这个概念是从中国来的。

在亚当·斯密之前,法国的重农经济学家魁纳,有一个经济表,他公开承认这个经济表就是从孔老夫子那里学来的。市场经济的老祖宗是在中国。我很赞成你的看法,在1920年代,《易经》、《庄子》、《老子》被翻译成德文,这是第一个翻成欧洲语言的《易经》全译本。

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智慧。共产党不能有私有制,但是中国共产党怎样走到改革开放这条路上来?私有财产的支配内容一个是支配权,可以买卖,但更重要的是使用权。中国人土地不能买卖,但是我可以让渡70年的使用权给你。比如这样,不能买卖所有权,但我把这块地的使用权给你1000年,过了20年,还有980年。再卖给你,你又转一手,又用了50年,还有930年,这不就和所有权买卖一样了吗!所以,所有权跟使用、受益权不是绝对对立的,如果把所有权弱化,把使用、受益权无限长的延伸,其实,就是所有权了。中国人的阴和阳是这样来看的。

李文波:我不是搞法律的,是搞工程的。今天我在这里学了很多历史、哲学的知识。朱教授学的是法律,所以大部分是法律和历史的观点。

我是外行,刚发现电脑原来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老子》里面的阴阳一正一负,没有老子就没有今天的电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联邦德国的公民教育”。

大纲中的分类一是社会教育,二是学校

教育。但我发现在德国有两样教育,中国比较弱,就是家庭教育,还有影响很大的教会教育。德国长期受教会影响,宗教思想多多少少在影响人的作为。中国有佛教思想,有儒家思想,有道教思想,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都毁了。现在又有点慢慢在回来,又有人搞孔子学,读《论语》,这都是好现象。

家庭教育很重要。小孩子出生之后,中国人先把他绑得很死,不能动,一动就不行。而外国人跟我们相反。中国的家庭不把小孩子当成一个人,不准动,要听话。为什么?我是你爸妈!小孩子在德国,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家里面的时候蛮听父母的话,可是一上幼稚园、小学之后,慢慢就不听了。他们学会一样东西,叫做“权利”。我们中国可能不一样,什么叫人权,打他两个巴掌就没事了。家庭教育应该是学校教育重要的辅助。社会教育也很有意思,感觉社会教育是国家的事情,可是在国外,社会教育是大家的事情。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工作,只是工作。而德国大学毕业,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学习。比如进入工厂,首先是一个职员,有很多课程可以选择;选完学完之后,还有很多成人教育。德国的成人教育非常发达。刚才所说的公民教育好像是政治教育。政治教育更是个麻烦的事情。在中国,任何东西都可以碰,政治两个字不能碰。

朱教授讲得非常对,在社会上,有媒

体、政治实践、法院判决等等巩固深化公民教育。可是这里还缺少一样东西，就是全民的政治意识。所有的成年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应该在社会上灌输、影响、深化公民教育，他们接触和了解的东西多，比普通民众更有思想深度。这是我所想补充的。最后还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你在最后谈到，当今中国如何借鉴联邦德国的公民教育，把当今中国的现象，法治国——社会国——文化国，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民主——科学——国家的独立与统一，与孙中山的民权——民生——民族排在一起，好像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以人为本变成民权主义，和谐社会变成民生主义，科学发展观变成民族主义。假如我们再看法治国——社会国——文化国，这三样是不是可以和民权——民生——民族也对位？我感觉不太一样，孙中山的民权就不是法治所能包括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也不是可以涵盖一切的基本政治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

那么，对应中国的公民教育，我们该走哪条路？从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拣出精华，但不是说《老子》、《孟子》就是精华了，不能说有了《易经》就能把电脑发明出来了。国外的人权思想如果适用，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国文化里找出精华，为什么不在世界文化里找出精华为我们所用？

最后一点，你是民进党的发起人之

一，民进党的党章一定有你的心血。但是民进党党章包容性差，很狭隘，请你讲讲这段历史，是什么原因，使得你放弃了你的宽容性？

我在台湾生活了十三年，从1949年一直到60年代。我是坐船逃过去的，去了之后到台中，但是我不会讲台湾话。我们的中学，总共五个外省人。课堂上老师都讲台湾话，我们根本听不懂。我们的住所，朋友找了一个仓库，里面五张竹床，自己买菜做饭，很苦。老师就过来这里用国语给我们上课。后来上了师大附中，全是讲国语的，没有人讲台湾话，包括连战本人，连战是我同班同学。当时大家气氛都非常好，没有人谈到外省人。我现在回忆后来什么时候又兴起外省人的话题，是不是民进党起来以后，为了找一个理由，把“二二八事件”抬出来。到底有多少人受过“二二八事件”的迫害，又有多少人受过日本人的压迫？国民党不好，完全正确。我们在师大附中的时候就有读书会，我几个很好的同学，突然一下子就不见了，被送到绿岛去了，那个时候是很黑暗。但是，“二二八事件”为什么会翻案，为什么隔了那么多年才翻出来？

朱高正：我分六个问题来答。

第一个，你把我意思扩大解释，但我还是要讲一下，《易经》和电脑真有关系。1703年，第一个发明计算机的是莱布尼兹。他在1703年通过耶稣会一个

传教士拿到了伏羲八八六十四卦方圆图。他发现用0来代表阴爻,用1来代表阳爻,对这种二进制的演算有信心。于是在1703年,他向法国的皇家科学院递交论文,主题《关于只用0和1两个数字作为运算的原则》,副题《兼对中国古代伏羲图的解释》。

李文波:这个我知道,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人家发明的东西,我们因为一点成绩就变成我们的了?

Gebhardt:你们两个观点都对。莱布尼兹其实向中国皇帝提出过一个请求,我是否能成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他当时能成为一个中国人的话,他的智慧中国人就能利用了。但是中国皇帝不感兴趣,认为中国人已经太多,就没有让莱布尼兹的计算原则为中国所利用。如果相反,那微软就不是从美国出来的了,微软应该从中国出来。中国人最大的本领在于描述,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我认为最佳的组合是把外国的精华和中国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模块,装在中国的这台机器上。

朱高正:我不喜欢扩大,好像什么我们都古已有之,我很反对这样。吴大猷先生说“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他很讨厌人家随便去讲《易经》。我特别把莱布尼兹这一段拿出来,你不知道,原来全世界第一个搞机械计算机的是莱布尼兹。的确这样,而且他提供给法国皇家科学院的论文题目就是这样,不是随

便说我们古已有之。

第二个问题。今天我的主题是讲联邦德国的政治教育或公民教育。其实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是可以互用的,也就是它的主题是:作为这个政治社会的一分子,你怎么去意识到自己不是单纯的臣民,不是单纯的被统治者;怎么来参与运作这一部国家机器,让你有能力来参与运作包括改善它,这个就是公民教育的主旨。

我把它分成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教会教育绝对不能放在这里。教会是独立在政治之外的,这个从《魏玛宪法》以来,向来如此,世俗的教育不容许教会的教育去碰触。家庭教育属于社会教育的一环。我刚才是举个例子,但并不限于那几个。

第三个问题。第五大项历史背景,我讲的是历史上的民主、科学,而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为争取民族统一和富强而来。这三个比较具体一点的内涵,就是要引进自由主义,要工业化现代化,要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斗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刚好可以跟这三个分别来对应,这就是我的主题,这三个事实上是全世界都要面临的问题。

放到现在中国,民主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科学如果相当于民生主义、现代化的话,那就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相当于提升国

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事实上，三个全部都扣在振兴中华上面，最高指导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荣辱观放在国家独立与统一这一块，比较接近，民主、科学再配一个伦理。但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我完全没有要去扣。刚才已经讲了，我是想提出十六大以来的几个最重要的关键字。如何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这里敦促共产党进步得更快，走得更好，听得进去。当初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候，那时负责最后组稿的就是龚先生，问我这个应该是刀旁还是水旁？我说水旁，因为秦始皇也有法制，哪一个国家没有法制。我们要的是 rule of law，不是 rule by law。那个 law 要从哪来？按中国人的讲法，要上合天理，下顺人情。

举这几个例子，是给大家做个引子来讨论，不是把这个来对照法治国——社会国——文化国。法治国有法治国的问题，社会国有社会国的问题，文化国有文化国的问题，光讲这个，那三个小时讲不完，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第四个问题。民进党的党纲原来是我写的，没错，但是绝对不是现在你看到的那样。就是因为他们在 1988 年开始要往台独去走，我坚决反对，就引起我们内部非常激烈的冲突。到最后，我就说那这样吧，我退出民进党。之后，他们才在 1991 年把台独党纲，放进民进党的党

纲里面去，就变质了。

在台湾，像我这样为自己的政治理念负责的人，绝无仅有，为此我可以把大好的江山都放掉。很多人都说，只要你不离开民进党，哪能轮得到阿扁。我对富贵是看得像浮云一样，只对理念来负责。要不是为了整个祖国地现代化、民主化，我在台湾不会那么拼命。

第五个问题。既然我是研究康德的专家，为什么不把康德的精华用到中国来？我最近碰到一个美国研究朱熹的最有名的教授——田浩，因为他也曾经去德国进修过一年。我跟他讲：“我有个想法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要是中国不发生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国势一落千丈，那康德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就不可能那么突出，因为康德那个位置本来是朱熹要坐的。”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我到德国去研究康德，很多人说我的胆子很大。康德很难读，但是我认为康德太好读了，只要你有中国儒家哲学的基础。我在那里写康德的博士论文，拿到非常好的成绩。为什么？理性主义本来就是从朱熹的性理大全那里来的，西方从莱布尼兹开始才有。尤其莱布尼兹的传人沃尔夫，他对中国文化推崇的程度，你难以想象。那时全欧洲大陆的教科书全采用沃尔夫的版本，他在 1761 年就职哈勒大学校长的时候讲，“我的道德哲学跟孔夫子一样”。那时候天主教控制大学，就把他开除了，但后来他又很光

荣地回到了哈勒大学,因为哈勒大学是启蒙重镇。你很难想象沃尔夫多么推崇中国的胎教,中国人怎么会在两千年前提到,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性情要平和,要听雅乐,这样子小孩子生出来才有高尚的品德。沃尔夫的哲学就是康德哲学的基础,本来康德都是搞沃尔夫,后来康德看了休谟的书,他才“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事实上康德从中国这边继承了很多东西,过去欧洲人不愿意承认,最近渐渐都被整理出来。比如说,莱布尼兹至少看过四十二种耶稣会传教士翻译过去的关于中国的著作。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华文化里面找?我想告诉你,中华文化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中华文化并不是一个死的概念,中国早在五千年前,随着地域的渐渐扩大,各地新的元素不断加入这个中华文化。

举个例子,我是《易经》的爱好者,从高二的时候就读《易经》。打太极拳先要做一个二十五分钟的缠绵功,利用这个时间我就可以把《易经》记诵半部。我热爱《易经》,读起来太有趣,妙不可言。中国本来就在吸收全世界的精华,中国这块大地本来没这么大,是后来陆续各个民族融合进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来的。

就像我去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做报告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要俄罗斯人来学中华文化,我说他们俄罗斯一

定要在自己的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里面找出现代化的新元素。就像我对阿拉伯世界,也是主张说,应该去《古兰经》里面找出一些和现代化元素相符合的文化精华。有人说要读康德,还是算了吧,你不懂德文读什么康德。读读《近思录》也可以,读读《论语》也可以,好书都可以读,为什么一定要读洋文才叫好书?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好东西,我们的传统文化需要一种现代的诠释。

我讲传统文化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要在中国文化里面找?因为在这里面找的是现成的,大家很快就会接受。我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从〈孟子节文〉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孟子节文》是什么?就是朱元璋本来不识字,后来学会了一点,看《孟子》的时候,看到“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这不造反了!就找人来开始删《孟子》。他把《孟子》一本书删掉了47%。大概二十年,都是这样的,直到永乐年间才恢复。现在国内还剩下两本,一本在山东省博物馆,一本在国家图书馆。我把国家图书馆的那本调出来,和台湾的四库全书本子对,把被删掉的47%,用心把它读起来,就成了一篇两万多字的节文。里面有很多现代民主政治的要素。

有人认为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难道西方有民主的传统?在古希腊,柏拉图是极权主义,亚里士多德也反对民主政治。西方的民主传统是跟着新兴的资

产阶级才出现的,到十八世纪他们还是专制主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谏官,职责就是要如实的把皇帝的起居生活记载下来,皇帝做得不对,就要指出来,讲皇帝不喜欢听的话。这对许多西方国家来说,都非常陌生。

最后引述孙中山一句话:“真的要搞政治,还是要中国。”像《大学》,格致诚正是修身的方法,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之后的功用。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那么多人生活在一起,历史延续那么久,还发展出相对比别人要合理的文明?只有中国。

晏小宝:今天的讲演很精彩,相信还有机会下次就这一主题继续开展讨论。下面请 Awe 博士为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做结束语。

Awe:亲爱的朋友们,我感到非常高兴,大家参加了今天的会议,有了这么好的讨论。朱教授刚才讲的内容给我带来

了便利,他其实已经对今天的讨论进行了总结,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国自己的文化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个不仅仅是朱教授的观点,全世界也得到了这一共识。

从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作为一个成年人,一定不能放弃对自己的继续教育和永不休止的思考,因为教育和思考是永远没有终结的。通过这个活动可以看到大家所持有的不同立场、所持有的不同观点,但是不同的立场与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通过互相的交流加以协调。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研讨会显然是我们阿登纳基金会在上海工作的一个亮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非常感谢今天会议的组织者晏小宝教授,特别要感谢今天的主报告人朱教授,最后还要感谢翻译,没有他的翻译我们相互间的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

(李新华 谢百盛 整理)

附录

二战后联邦德国的公民教育

在德国的联邦以及各州都设有一个负责开展公民教育的机构,该机构名为政治教育中心。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设在波恩,隶属于联邦政府内政部。

该机构始建于1952年,1963年改现名。作为一个面向全社会开展公民教育的机构,其宗旨是:当公民在学习和理解政治事务、形成和加强民主意识以及有意愿参与政治生活时,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支持与帮助。具体做法是采用报告会、研讨会、短期培训、展览、文艺节庆和考察旅游等方式或以编辑发行书刊和音像及在线产品的形式,针对人们关注的历史问题以及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发展现状,提供信息、阐明立场,鼓励活动的参加者与出版物的读者进行学习和思考,建立和健全自己的公民意识,培养和提高学习和参与政治的能力。

以该中心创建初期的50和60年代为例,当时联邦德国的社会各界认为,为了吸取纳粹统治的反面教训,政治教育

工作在引导其公民如何认识和评价历史问题,培养和形成民主、多元和宽容意识等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证明,该国的政治教育体系在肃清纳粹思想、促进民主政治建设以及重塑德国形象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有关如何面对统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深刻变革的内容,又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理所当然地成为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90年代国际领域的一个重点专题则是欧洲一体化的进展。进入21世纪后,反对恐怖主义、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内容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的热门专题。与此同时,民主政治、人权(包括妇女权益)保障、环境保护、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以及防止青少年犯罪等则成为多年来的重点选题。除此之外,有关反省历史、汲取教训、反对新纳粹主义的教育也始终是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组织的各类活动,有些是向全社会开放的,有些则是专

门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例如,由于教育工作者(学校的专业师资力量和各州政治教育中心的教员)的特殊作用,该中心每年都有专门为教师开办的培训班。同样,为了使政治教育在形式和内容上适合当今青年人的特点,培养其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兴趣,该组织也有一些较为成功地做法。今年夏季的“柏林08”即为面向14—24岁青少年和青年的大型文体野营活动,它除了安排报告研讨这类传统的政治教育内容之外,还提供音乐、电影和体育等多种娱乐节目,预计参加者将超过1万人。除此之外,媒体从业人员也属于德国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对象群体。在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精心策划的各种项目中,每年均有专门安排新闻工作者参加的活动。

近年来,该国的政治教育系统始终高度重视有关国际问题的教育工作。除了经常涉及欧洲一体化、跨大西洋的欧美联盟、全球反恐合作等专题外,往往将某个外国作为其重点对象,供感兴趣的活动参与者学习和研究。鉴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联邦政治教育中心近年来已组织过多次与中国有关的活动。今年4月7日—7月14日的“中国报告会——争议中的奥运会举办国”便是一次以中国为主题的大型活动。中心邀请不同的专家在9场报告会中就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介绍各自的看法,并在6月27日—7月6日举行中国电

影节。

德国的政治教育实际上是由一个庞大的体系共同运作的。除了联邦与各州政治教育中心外,不少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会共同参与举办大型活动。例如,上述的“柏林08”的主办机构除了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外还有联邦政府家庭、老年、妇女和青年部以及德国联邦青年联合会。而“中国报告会”是与波恩中国研究协会联合主办的,参与其中的还有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和波恩大学等。政治教育中心举办的各种培训、报告和研讨活动也往往会邀请社会各界的专家主讲。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另一个工作领域是编辑发行印刷、音像和在线读物,以便参加或未参加上述活动的公民选择阅读,从而进一步扩大政治教育的效果和影响。其中除了《政治与当代史》、《联邦政教中心丛书》、《政教参考资料》外,还有专门面向中小学社会和政治课程的教辅材料。这些出版物的作者往往都是德国的知名学者或专家,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各种出版物基本上是免费发放的,有些即使收费也会大大地低于市场价。

政治教育中心举办的各种活动有相当一部分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有些需要收费的也极为低廉,甚至低于成本价。例如,参加《柏林08》活动只需支付38欧元即可乘火车从其居住地往返。波恩

的中国电影节共放映 6 部中国电影,观众只需花 6.5 欧元(学生为 5 欧元)就可以购买一张套票,观看这 6 部电影。同样,参加政治教育中心组织的培训、考察或旅游活动,收费也相当低廉,明显低于市场价。例如,为纪念以色列建国 60 周年,政治教育中心组织了三次赴以色列的考察活动,分别为 9 天和 11 天,收费只有 800 欧元和 970 欧元。

为了确保政治教育工作政治上的超党派和学术上的平衡原则,联邦政府内政部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管理条例》从组织建设的角度作出了若干规定。

1. 中心主任由内政部长任命;
2. 设立监督委员会,其 22 名成员

全为联邦议院议员。他们先通过所属政党的议会党团提名,然后由联邦议院议长任命。

目前监委会主席来自于联盟党,副主席则为社民党人。政教中心主任和部长代表出席该委员会会议。

3. 设立学术咨询委员会,现由 9 名专家教授组成。其专业领域涵盖政治、社会、历史、传播、伊斯兰和东欧比较等学科。委员会委员(现任成员可推荐新成员)由内政部长任命,任期 4 年,可连任一次。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则由专家选举,内政部长批准。监督委员会成员可参加学术咨询委员会会议。

Kurze Übersicht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in Deutsch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Allgemeine Begriffserläuterung

Als politische Bildung werden die vielfältigen, meist staatlich finanzierten Bemühungen, Toleranz und Kritikfähigkeit zu stärken und damit zur Herausbildung und Weiterentwicklung von aktiver Bürgerschaft und Partizipation beizutragen, bezeichnet. Im Mittelpunkt steht dabei, die Interessen des Individuums zum Ausdruck zu bringen, insbesondere Teilhabemöglichkeiten zu erkennen, sich ggf. zu engagieren und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zu übernehmen.

Der Notwendigkeit demokratischer poli-

tischer Bildung wurde von den Regierungen und Gesetzgebern z.B. durch Einrichtung der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und der Landeszentralen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Rechnung getragen. Darüber hinaus wurden von allen im Parlament vertretenen Parteien politische Stiftungen eingerichtet, zu deren wichtigsten Aufgaben die politische Bildung zählt.

Begrifflich geht die politische Bildung auf die Politikwissenschaft und die Pädagogik zurück.

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pB)

Ziele und Aufgaben

Im Zentrum der Arbeit der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steht die Förderung des Bewusstseins für Demokratie und politische Partizipation. Aktuelle und historische Themen greift sie mit Veranstaltungen, Printprodukten, audiovisuellen und Online-Produkten auf. Veranstaltungsformate

der BpB sind Tagungen, Kongresse Festivals, Messen, Ausstellungen, Studienreisen, Wettbewerbe, Kinoseminare und Kulturveranstaltungen sowie Events und Journalistenweiterbildungen. Das breit gefächerte Bildungsangebot der BpB soll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motivieren und befähigen, sich kritisch mit politis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Fragen auseinander zu setzen und aktiv am politischen Leben teilzunehmen. Aus den Erfahrungen mit diktatorischen Herrschaftsformen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erwächst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ie besondere Verantwortung, Werte wie Demokratie, Pluralismus und Toleranz im Bewusstsein der Bevölkerung zu festigen.

Die unterschiedlichen Bildungsangebote der BpB vermitteln Einblicke in die historis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hänge politischer, kultureller, sozialer sowie wirtschaftlicher Prozesse. Ihre Aufgabe erfüllt sie in eigener gesellschaftspolitischer, pädagogischer und publizistischer Verantwortung. Sie ist überparteilich und wissenschaftlich ausgewogen. Als eine Institution der staatlich verfassten politischen Bildung fördert sie zudem Veranstaltungen von mehr als 300 anerkannten Bildungseinrichtungen, Stiftungen und regierungsunabhängigen Organisationen, di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tätig sind.

Die BpB hält besondere Angebote für Lehrerinnen, Lehrer und Personen in der Bildungs- und Jugendarbeit bereit. Jugendliche und junge Erwachsene spricht sie mit altersgemäßen Themen und Medien direkt an. Sie erarbeitet spezielle Medienpakete und Fortbildungen für junge Erwachsene in Sportvereinen, bei Bundeswehr oder Polizei. Im Zeitalter der Mediengesellschaft macht sich die BpB moderne Kommunikationsmetho-

den zu eigen und verfolgt einen crossmedialen Ansatz. Sie stellt sich den Anforderungen nach schneller und fundierter Information: Mit ihren Bildungsangeboten und speziellen Online-Produkten greift sie aktuelle gesellschaftliche sowie politische Ereignisse und Debatten auf. Interessiert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können sich bei der BpB also umfassend informieren.

Das Leitbild

Staat und Gesellschaf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aben auf Grund der Erfahrungen m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iktatur und der DDR eine besondere Verpflichtung, die Entwicklung eines sich auf Demokratie, Toleranz und Pluralismus gründenden politischen Bewusstseins zu fördern. Vor diesem Hintergrund wurde 1952 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gegründet.

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orientiert sich mit ihrem Bildungsangebot an den Grundfragen der demokratischen Entwicklung und des 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lebens. Sie stellt sich mit ihrem Angebot auf die gesellschaftlichen Veränderungen ein, die sich u. a. aus den Anforderungen der Globalisierung und der Herausbildung von Strukturen der Wissensgesellschaft ergeben.

Die BpB ist dem Grundgesetz, den Menschenrechten und der demokratischen politischen Kultur verpflichtet. Die Grundsätze der Überparteilichkeit und wissenschaftliche

Ausgewogenheit und Bildungsaufgabe erfüllt die BpB in eigener gesellschaftspolitischer, pädagogischer und publizistischer Verantwortung.

Als Institution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überprüft die BpB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ihre Angebote und reagiert flexibel auf aktuelle Herausforderungen des demokratischen Gemeinwesens. Als Serviceeinrichtung für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bearbeitet die BpB Anfragen und geht auf Anregungen und Kritik ein. Als lernende Organisation verbessert sie durch Innovationsbereitschaft kontinuierlich die Arbeitsprozesse und Arbeitsergebnisse.

Gender Mainstreaming wird von der BpB als Querschnitts- und Gemeinschaftsaufgabe verstanden und findet sowohl auf die Organisation wie auf das Handlungsfeld Anwendung.

Die der BpB anvertrauten öffentlichen Gelder werden nach den Geboten der Wirtschaftlichkeit eingesetzt. Sie unterzieht ihre Arbeit einer kontinuierlichen Effektivitäts- und Effizienzkontrolle.

Zur Erfüllung ihres Arbeitsauftrages arbeitet die BpB als Schnittstelle zwischen Staat, Politik, Bildungsinstitutionen, Wissenschaft und Medien mit allen Kräften der Zivilgesellschaft. Ständige Kooperationspartner sind vor allem die Landeszentralen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und die freien Träger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Darüber hinaus sucht die

BpB die Zusammenarbeit mit anderen Bildungseinrichtungen, Nichtregierungsorganisationen, Stiftungen und anderen gesellschaftlichen Akteuren.

Durch den stetigen Diskurs mit ihren Partnern über Ziele, Inhalte und Methoden der politischen Bildungsarbeit werden Kontakte und Netzwerke, Erfahrungen ausgetauscht und Synergieeffekte erzielt, initiiert und gefördert.

Die Grundregeln des demokratischen Diskurses sind Bestandteil der Corporate Identity der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nach außen und nach innen.

Offenheit, die Bereitschaft, faire und konstruktive Kritik zu üben und anzunehmen, Veränderungsbereitschaft, gegenseitige Achtung und Wertschätzung bestimmen die Zusammenarbeit und die Umgangsformen.

Jede Mitarbeiterin und jeder Mitarbeiter hat die Möglichkeit, Verbesserungen anzuregen und Initiativen zu ergreifen und ist aufgefordert, sich an der gemeinsamen Entwicklung des Arbeits- und Aufgabenbereichs der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zu beteiligen.

Sie erarbeiten in partizipativen Prozessen kurz- und mittelfristige Ziele, die in verbindlichen Vereinbarungen festgehalten werden. Durch ein verlässliches Informationssystem sorgen sie für Transparenz der Planungs- und Entscheidungsprozesse.

Liste der politischen Stiftungen in Deutschland:

- Friedrich-Ebert-Stiftung
- Friedrich-Naumann-Stiftung
- Hanns-Seidel-Stiftung
- Heinrich-Böll-Stiftung
- Konrad-Adenauer-Stiftung
- Rosa-Luxemburg-Stiftung

Kurzer Abriss über die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Nach de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stand die Entnazifizierung der Deutschen im Blickpunkt. Dabei stand eine Demokratisierung der Deutschen im Vordergrund. Der Alliierte Kontrollrat beschloss in seiner „Direktive 54“ vom 25. April 1947 eine Förderung der Schulen zur „Entwicklung eines bürgerlichen Verantwortungsgefühls“ und „Auffassung einer demokratischen Lebensweise“. Gleichzeitig entstanden neue Lernorte und Bildungsprogramme, besonders für Frauen und Jugendliche. Der Weg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war jedoch von Schwierigkeiten geprägt, bedeutete er doch eine Komplettumstellung. Die Bundesländer erhielten im Folgenden die Zuständigkeit über die politische Bildung.

Anstöße kamen hier aus der Pädagogik und der Politikwissenschaft. Die Diskus-

sionen um die „Aufarbeitung der Vergangenheit“ verstärkten ab Ende der 1950er Jahre die Ansätze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Begründung und professionellen Arbeit.

Die Einrichtung von Lehrstühlen an Universitäten gab Anlass zur allmählichen Umbildung von erziehungsphilosophischen Theorien zu fachdidaktischen Konzeptionen. Außerhalb der Schulen verbanden sich an verschiedenen Stellen einflussreiche Kräfte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mit den Impulsen der 1968er-Bewegung.

In den 70er und 80er Jahren entstanden vor allem in der Erwachsenenbildung eine Vielzahl neuer Institutionen, einerseits geprägt vom politischen Gestaltungsoptimismus dieser Jahre, andererseits mit angestoßen von einer neuen Weiterbildungs-Gesetzgebung in vielen Bundesländern. Je-

doch existierte in den 80ern ein zunehmendes Desinteresse an der Politik aufgrund der politischen Polarisierung und einer Stagnation und Resignation in Folge der Lehrerarbeitslosigkeit.

Die Vereinigung Deutschlands stellte neue Herausforderungen an die politische Bildung, gleichzeitig ist diese Phase gekennzeichnet durch zahlreiche Neuberufungen auf Professuren, neue Doktoranden und eine neue Bandbreite an Fachzeitschriften,

Buchreihen, Lexika und Handbüchern. Dabei spricht man heute von einer „Politikdidaktik“, d.h.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Politik-/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Die Aufgaben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im 21. Jahrhundert wurden 1997 im Münchener Manifest durch 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und die Landeszentralen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festgelegt.